

汉代至北宋 《论语》学史考论

*A Research on Histories of the Study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Earlier Song Dynasty*

蒋鸿青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漢代至北宋

《論語》學史考論

*A Research on Histories of the Study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Earlier Song Dynasty*

蔣鴻青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至北宋《论语》学史考论 / 蒋鸿青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201-1909-2

I. ①汉… II. ①蒋…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864 号

汉代至北宋《论语》学史考论

著 者 / 蒋鸿青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孙燕生 陈旭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1909-2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12YJA751026

(二)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序

自西汉迄于清代，儒家经典诠释之作卷帙浩繁，每一部经典都衍为专门之学。专经学术史因而成为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品类，当代学人撰著的此类著作已遍及群经。观其时间断限，或囊括历朝，或并包数代，或专注于一代，或仅限于某一朝代的特定时段。从内容方面考量，则莫不具有特定的学术史意义。蒋君鸿青所著《汉代至北宋〈论语〉学史考论》，是关于汉代至北宋《论语》学的专题研究。从两汉章句训诂之学，到魏晋融通玄、儒之学，到唐初经世之学，再到北宋理学，《论语》学史上最具原创性的诠释范式与理论形态业已生成，故可视为相对完整的发展变化过程。以此为研究范围，是符合学理的。

专经学术史研究对于经典诠释具有重要意义。经典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思想理论可以垂型后世，并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经世效能。但其前提是经典的广泛传播与应时诠释。正是在这一环节，经学家的学术创造居功至伟。专经学术史的任务，是对历代经学遗产作出精当的总结，从而为来者正确地理解经典并从中获取教益，提供必要的参考。

从历代经解的内容看，专经学术史研究的重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梳理学术源流。特定时期的重大社会需求是经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经学思潮的生成和延续则是其突出的表征。经学思潮的核心是经典诠释的学术取向，经学思潮的嬗变也会在这方面清晰地反映出来。鸿青以考述《论语》学的传承与演变为考察重点。应当看到，成书于清中叶的《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总叙》中所谓历代经学之六变，已经梳理出经学思潮发展变化的清晰脉络。皮锡瑞《经学历史》考述甚详，这是今人继续研究的起点。但就专经学术史而言，全盘套用已有的结论是有局限性的，需要从专经之学的实际出发，稽考其具有独特性的演进线索。在这方面，鸿青作出了一定努力，且有所发现。如论魏晋时期卫瓘、蔡謨、范宁诸家《论语》学为汉

学诸支派的延续，论颜师古的《论语》学在唐初具有学术转型的意义，都是有新意的。

二是展示经文考释“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学术进程。文本源流梳理、文字校勘、语词训诂以及制度名物与史事考证是经学研究的基础环节，因而也成为专经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这些环节作历时性的专题研究，有可能成为专经学术史研究出彩的场域。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学者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其难度之大，想必有实践经验者都能体会。鸿青这部专著在《论语》文本考释的诸多层面展开专题研究，通过不同时期经说的比较，剖判精粗得失，揭示经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兹举一例，孔安国的《论语训解》成书时代较早，因其为孔氏后裔，又转益多师，其书述孔子家人弟子生平、学行较详，于经文所涉其他历史人物也多有解说。东汉包咸、马融有所考补，后儒则大体是祖述两汉经师。《论语》所涉历史人物之数是确定的，传世文献中与之相关的材料也是可以见底的。鸿青既列举孔安国、包咸、马融遗说，又不复举后起经师之说，这是从实际出发的精到择取。

三是发掘历代经师通经致用的微言奥义。北宋以前的《论语》学，虽然在诠释取向方面多有变迁，追求通经致用的目标始终不变。不少经师在解说《论语》时往往有独到见解。研究这一时段的《论语》学，展示各家义理诠释的精义，也是学术史家的任务。在学术史上，经学思潮的转变往往伴随着新学说对旧学说的严厉批判与否定。最突出的事例，是理学对唐前经学的否定。程颐认为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在孟子之后已失传，唯其兄明道能绍承之。朱熹则认为二程能够传承上古圣贤道统，他本人也发愿以此为务。而清代汉学家又转而攻击理学家荒经蔑古，力图以两汉经学为主要资源重建儒家学统。《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针对“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的门户纷争之习，主张“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以期求公理、明经义。今之经学史研究更应超越旧时代狭隘的门户畛域，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与当代的价值理念综理经学文献中的思想遗产。鸿青的专著在这方面作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探讨。他本着实事求是、兼收并蓄的态度，多能具体而深微地揭示两汉至北宋《论语》学文献中的思想精华。其所陈述，相信值得读者参考。

注重以历代经师的学术思想与其治学实践互相证发，是鸿青专著的特

点与优点。唐前许多经学家的《论语》学著述颇有亡佚，但往往散见于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等书。鸿青汇聚这类文献资料以及清儒辑佚成果，对诸家之学钩沉发覆，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特定时期《论语》学发展的概貌。其不避繁难的治学态度值得称道。

我于早年承业师蒋逸雪先生指授，乃知读经。后参与《刘申叔遗书》整理项目，乃知治中国学术史。复蒙业师祁龙威教授提携，自20世纪90年代初为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近代经学史”，其后以所积讲义编为一书付梓。2000年开始指导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遂辟“中国经学与文学”学科方向。又效清代扬州经学家刘文淇、刘宝楠等相约各治一经之意，鼓励门下诸贤以专经学术史为学位论文优选课题。持续至今，《周易》、《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左传》、《论语》和《孟子》等诸经之研究史，皆有撰为博士学位论文者。鸿青主修《论语》学史，以其心得撰为专著。当其书付梓之际，予略陈浅见，兼述渊源。值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渐入佳境之新时代，期待作者继续勉力向学，取得新的成就。

田汉云

于扬州柳湖南苑

2017年11月6日

目 录

绪 论	001
一 《论语》成书过程简说	001
二 《论语》学的历史演进	007
三 汉代至北宋《论语》学史研究概述	009
四 研究思路与学术方法	012
第一章 西汉：《论语》学的发皇	014
第一节 《鲁论》《齐论》之学勃兴	014
第二节 幽光微茫的《古论》孔氏学	020
第二章 东汉：今古并行与整合	036
第一节 包咸：《鲁论》之学的改良	036
第二节 马融：《古论》之学的进展	046
第三节 兼综今古文的《论语》郑注	056
第三章 魏晋：汉学之延续	070
第一节 卫瓘：古文《论语》学的嫡派	070
第二节 蔡謨：《论语》今文学的苗裔	074
第三节 范宁：绍承汉学 推陈出新	080
第四章 魏晋：儒道之交融	091
第一节 何晏：开启以道济儒的路径	091
第二节 缪播：追求尊儒与宗道的协调	104
第三节 郭象：《论语》玄学化的智者	112

第五章 东晋：崇尚玄悟 不薄事功·····	119
第一节 李充：尊儒家之本 引道家之旨·····	119
第二节 孙绰：以儒统道的《论语》诠释·····	133
第三节 江熙：两晋《论语》学的殿军·····	143
第六章 南朝：经疏仅存的《论语集解义疏》·····	158
第一节 《论语集解义疏》及其学术渊源·····	158
第二节 皇侃的《论语》观·····	163
第三节 《论语集解义疏》的阐释特点·····	170
第四节 《论语集解义疏》的经学思想·····	185
第七章 隋唐：从返本到开新·····	210
第一节 颜师古：传家归汉 崇尚事功·····	210
第二节 韩愈、李翱：弘扬儒家内圣之学·····	223
第八章 北宋：从汉学到宋学·····	235
第一节 邢昺：推动汉学向宋学的转型·····	235
第二节 程颐：精义为本 默识心通·····	251
结 语·····	266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77

绪 论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中的这句话，形象说明了孔子在泱泱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①温故而知新，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研究儒学，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研究《论语》，坚持和发扬其经世致用、文以化人的优良传统，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论语》与“五经”相比，虽然是“传”“说”之属，却具有特殊价值。赵岐《孟子题辞》说：“《论语》者，五经之鎡辖，六艺之喉衿也。”对于后人把握“五经”的文化精神和孔子的理论体系，《论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与《论语》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奉为主流思想，《论语》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学术资源。《论语》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是由其不朽的思想价值决定的。

一 《论语》成书过程简说

关于《论语》编纂成书的年代，古今学者提出了种种见解。由于文献不足征，始终未见有人能够精确考定，但应当说古代学者已经窥见史实的

①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24 日）》，《孔子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4~8 页。

梗概。

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向语：“《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所引刘向之语的来源，今不可知。有学者推断出自刘向校书时所撰的《别录》，可备一说。王充《论衡·正说篇》：“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赵岐《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两汉学者的这些意见，都不详所本，也可能原无所本，只是据《论语》本身作出的分析。就《论语》的全部文字看，如刘向所说，主要是记录孔子的“善言”。可是，《论语》中也有记述人物活动的文字，所以，王充的见解对刘向之说具有完善意义。孔子周游列国，长期讲学，《论语》所载孔子与人交谈的内容也未必有专人长期司记录之责，故赵岐、宋均认为《论语》是众门人汇集孔子言论、行事而成。这些见解，应当说已经指出了《论语》内容最初萃集的大概情形。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叙述，论孔子交谈的对象，兼顾“弟子”与“时人”；论谈话资料的积累，兼顾亲历其境与间接闻知；论成书，认为有内容由分散到集中、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严格说来，《论语》中有少数段落的言谈主体并不明确，但是，可以大致理解为孔子或其弟子。因此，《汉书·艺文志》的这一表述是可以信从的。

孔门弟子何时汇编孔子言论、事迹而成书？有学者认为在孔子卒三年之际。这一看法，因缺乏坚实的证据，难称定论。^①如果说在孔子去世之后数十年间，其门人因传播师说、讲学授徒的需要而编纂《论语》，可能更为圆通。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学者也多有探讨。郑玄认为，《论语》是“仲

① 《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类似记载。今人黄立振在《〈论语〉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一文中认为：“以常情而论，孔子歿，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单承彬据此推定《论语》“应该编纂在孔子去世后的三年间，亦即前479至前476年之间”。（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33页）

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① 刘宝楠从其说。他说：“要之，《论语》之作，不出一人，故语多重见。而编辑成书，则由仲弓、子游、子夏首为商定，故传《论语》者能知三子之名。郑君习闻其说，故于《序》标明之也。”^②

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引魏宋均注《论语崇爵谥》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这一说法也值得重视。虽然其中明显混杂了西汉今文经学的观念，以孔子为“素王”，强调《论语》中有微言大义，此类说法兴起稍晚，先秦时期无有；但是，以子夏列《论语》编纂者之首，比较可信。

首先，从孔子与子夏的年辈差异看，子夏有可能掌握其师与同门的生平与思想资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年辈既晚，不但可以得知孔子言行，也可以获悉孔子死后其弟子的言行。

其次，从子夏的学问专长看，他有能力编纂《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载：“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这是说，子游、子夏的突出长处在于文学一门。《史记》又载，孔子修《春秋》，精心取裁，“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是以子游、子夏无从置喙来衬托孔子学问高深，其前提则是游、夏具有文学特长。孔子曾与子夏谈论《诗经》。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③ 孔子认为，构成美貌的因素，天成为主，装饰为辅。子夏进而推论士人品格之美，以为言行循礼犹在德行高尚之后。这是子夏善于从积极、主要的方面对事物的意义作举一反三发挥的典型事例，所以，孔子称赞他适合解读《诗经》。这件事，也证明子夏确实长于文学。孔子对他发挥文学特长有特定的要求和期许：“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何晏对两类儒者的界定是：“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从子夏在孔

①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2008，第122页。

②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2016，第793页。

③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75，第2202页。

子去世之后的学术活动看，他能够遵循老师的教诲。《论语》行文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且饶有诗意，非长于文学者不能作，而子夏是孔子弟子中少数足以胜任者之一。

再次，子夏的政治际遇和学术活动使其有可能亦有必要编纂《论语》。《史记·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司马贞《史记索隐》：“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则未闻也。”^①在孔子身后，其弟子宦游列国，子夏居魏，儒学最受重视。魏文侯亲受其业，贤士大夫亦多出其门下。《礼记·乐记》有子夏与魏文侯讨论音乐的记述。魏文侯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并请子夏说明，何以会有这种情形。子夏指出，魏侯所好为“音”（曲调），而不是儒家所谓“乐”，“乐”与“音”相近而不同。古乐有治世功能，而所谓新乐，如郑、卫、宋、齐之音则偏重于娱乐，“皆淫于色而害于德”。他建议，“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注重以庄重严肃的音乐来教育、引导臣民。子夏的观念，与孔子所谓“放郑声”是一致的，并且可以用来解释孔子话语的内蕴。子夏在魏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应当归因于其授业内容之精博。他以本门经典教人，固然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总结、利用、传播孔门师弟的思想也必定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他既有条件也有必要编纂《论语》。

最后，子夏是孔子之后儒家经传与学说最重要的传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毛诗》传授系统，存录两个分支。一是徐整所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苍子，薛苍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另一说是：“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两说都以子夏为始。《汉书·楚元王传》：“少时尝与穆生、

^① 《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75，第3116页。

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盐铁论》说：“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清儒汪中统计，《韩诗外传》引《荀卿子》以说《诗》者，计44处。既然《鲁诗》与《韩诗》也出于荀子，则与子夏也有学术渊源。应劭《风俗通》：“穀梁为子夏门人。”汪中指出：“《礼论》《大略》二篇，《穀梁》义具在。”^①《经典释文》叙《春秋》学源流：“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据今人马勇考证，此左丘明就是子夏。^②汪中认为：“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没，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从孔子到荀子，儒家经传在其间最重要的传授环节是子夏。正因为从子夏到荀子，从荀子到汉儒之间存在紧密的渊源关系，汉儒对子夏的学术活动所闻较多，所以他们关于子夏主编《论语》的说法才值得重视。《论语崇爵讖》以子夏为《论语》的首要编纂者，当非凭空臆造之说。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论语》编纂与曾子及其门人子思关系最为紧密。唐明贵认为：《论语》所记时代最晚的事件是《泰伯》中的曾子之死。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享年七十岁。《论语》全书记曾子单独发表的言论有十二次，且一律尊称为“曾子”。可推想《论语》为曾子门人编纂。子思为曾子门下之佼佼者。“《大学》成于曾子之手，代表了曾子的思想。《中庸》成于子思之手，代表着子思的思想。在学术思想上，二者具有前后承接的关系，因此，曾子和子思具有师承关系。”据《孔丛子·公仪篇》，子思所记其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故子思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召集孔子的再传弟子，以残存的孔子弟子所汇集的资料为底本，广搜博采，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辑补，编成《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③这一看法也言之成理。

既接受子夏编纂说，又接受曾子、子思编纂说，似乎存在矛盾。事实

①（清）汪中：《荀卿子通论》，田汉云编《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4，第412、413页。

② 房玄龄《晋书·荀崧传》载崧上书：“孔子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既没，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马勇认为，荀崧以“左丘明与子夏为一人”，并从历史地理、子夏生平等方面加以论证。其说可资参考。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

③ 唐明贵：《论语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55~68页。

上有学者认为这两种见解不能调和。康有为在《论语注》序中说：“《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出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代曾门记其启手足耶！”唐明贵认为“康氏所言虽不尽然，但他提出的证据已足以驳倒郑说”。^①其实未必。子夏与曾子一系完全可能各有纂述孔子言行的文本，再由后学合为一书。如刘宝楠所谓《论语》“语多重见”的现象，只有在汇编不同文本为一书时才会出现。

《论语》最初编纂成书之后，是否即题作本名，也是难以定论的问题。从传世的文献看，最早是《礼记·坊记》称之为《论语》。其文云：“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坊记》多以孔子口吻议论。《隋书·音乐志上》载南朝梁沈约语：“《中庸》《表記》《坊记》《缙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子》的成书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照此推论，《论语》的定名时代似乎在《子思子》成书之前。但是，《坊记》这段文字在表述上有可疑之处，从上下文看“《论语》曰”云云是对“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的解说，不会是孔子的话语。若剔除此语，其叙述体式便与全篇吻合。因此，“《论语》曰”云云，当是后人注文被羈杂为正文。

探讨《论语》最初的名称，应当以西汉人对它的称名作为参考。西汉人提到《论语》，或称《论》，如刘向《别录》：“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合壁所得，谓之《古论》。”《汉书·张禹传》：“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或称《语》，如《尹文子·大道下》：“《语》曰：‘恶紫之夺朱，诬利口之覆邦家。’”此语见《论语·阳货》。《盐铁论·通有篇》：“《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立本末。”前一句本《论语·子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之文。《盐铁论·授时篇》：“《语》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此文引自《论语·子路》。《论》《语》可能是记述孔门师弟言行且内容颇有异同的两部书。刘向所谓

^① 唐明贵：《论语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51页。

“合壁所得”，实指两种文本合二为一。

《韩诗外传》有三处言及《论语》这一书名。卷二：“《论语》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接輿之妻是也。”卷五：“《论语》曰：‘必也正名乎。’”卷六：“《论语》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按《史记·儒林列传》载：“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按韩婴老寿，至武帝朝仍在世。《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所以，《韩诗外传》称《论语》之名，实不能证明其确定在此之前。《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对策用《论语》之名，亦在武帝朝。

王充《论衡·正说篇》：“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王充所叙主要是东汉中期以前《论语》流传的情形。其中殊可注意者有以下几点：其一，齐、鲁、古文三种版本的《论语》内容多寡及分篇不同。其二，汉世所传孔子弟子记录其师言行的文献篇目甚多。其三，古文《论语》因其文字形体古奥，西汉学者释读艰难。其四，汉宣帝时官方尚未认定其名为《论语》。其五，《论语》作为书名，最初由孔安国及其弟子拟订。

二 《论语》学的历史演进

唐明贵的《论语学史》将《论语》学的发展史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两汉，为形成期；二是六朝，为发展期；三是隋唐，为中衰期；四是宋元明，

为复盛期；五是清代，为总结期。^①这种分期大致符合实际，但是关于某些时期的断限，以及《论语》学成就与特征的总结，还可加以讨论。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论语》学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战国至西汉中期，为《论语》编纂成书与传播扩散期。在孔子身后，儒家学派因孔门弟子散布四方而扩大影响。儒家后学基于传习孔子思想理论的需要而追记、整理孔子言行；孔子的再传弟子为了弘扬师说，兼记孔子门人的言行，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不同地区的儒学支派所掌握的孔门师弟言行的资料，因师承系统与区域文化的差异而有篇数与用字的差异。这些文本传至西汉，影响最著者有《鲁论》《齐论》。最近有学者提出，在文景之世，已经出现了传习《论语》的专门家。栗振风的考证结论是，《汉书·艺文志》叙述传习《论语》者数家，首举常山都尉龚奋，“龚奋为《论语》名家时，很可能在文帝时期。赵岐《孟子题辞》说文帝曾置《论语》等传记博士，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亦言：‘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宫，为置博士。’故而，龚奋很可能即为文帝时所立的《论语》博士，《鲁论语传》或即为龚奋为《论语》博士时所撰”。^②

第二阶段为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是《论语》学的繁荣时期。其时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术，治《论语》学者增多。《鲁论》有《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齐论》有《齐说》，以讲论义旨为主；《古论》有孔安国《古文论语训解》，兼及考据训诂，三者都自成一派。安昌侯张禹兼通《齐论》《鲁论》，“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③这是《论语》文本的一次重要整合。东汉注家群起，今古并行，其主流是章句之学。东汉末，郑玄据《张侯论》，酌取《古论》而撰注，在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阶段为魏晋南北朝，是《论语》学深受玄学影响的变异时期。首先，应当注意到汉儒《论语》学的传统在魏晋时期不乏衷心拥戴者。如王瓘、蔡謨、范宁坚决抵御玄学对于儒学的渗透，不仅延续了《论语》汉学

① 唐明贵：《论语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9页。

② 栗振风：《西汉早期〈论语〉学研究》，《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61、62页。

③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82，第939页。